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86期(民國103年12月),199-205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夫馬進著，伍躍譯，《朝鮮燕行使與朝鮮通信使：使節視野中的中國‧日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370頁。

吳政緯[*]

自美國學者費正清(John K. Fairbank)提出「中國世界秩序」(Chinese World Order)後，朝貢體系逐漸成爲學界慣用的分析概念。綜觀費氏以降的學人，不論同意「中國世界秩序」與否，其關心之處仍繫於中國與周邊各國的互動與交往。相較之下，本書更著眼於奔波在各國貢道上的使節，作者關心的是在「近代前夜的東亞」（early modern East Asia），中國、朝鮮和日本三國士大夫專注於哪些問題？而這其中又傳達了何種深意？

一

作者京都大學教授夫馬進，其《中國善會善堂史研究》深入地析論晚明至民初的各式慈善組織，堪稱明清社會史的經典之作。不過，較不爲人所知的是，作者在寫作善會善堂史之際，已開始研究《燕行錄》等使行文獻。《燕行錄》係朝鮮使節來往於中朝之間的旅行日記、報告文書，這種特殊的文獻不僅從域外提供各種中國史寶貴的線索，其時間連續、記錄縝密的特性，也爲觀察中國思想文化與社會風俗提供親身的見聞。作者認爲這些朝鮮使臣寫的旅行紀實除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生

了充滿趣味外，更重要的是「記下了中國人通常不屑記錄的內容」。（序頁 2）本書即是作者 20 年（1989-2008）研究成果的集結，爲盡快呈現給中文讀者，在日文版尚未問世的情況下，由作者的高足伍躍翻譯出版。全書正文共計十章並附錄，分成三部呈現。

第一部「十六七世紀燕行使對中國的觀察」共三章。前二章中，作者先以二種《燕行錄》爲中心，呈現朝鮮士人對明朝（中華）各種現象的批判。萬曆二年（1574），朝鮮燕行使許篈（1551-1588）與趙憲（1544-1592）一同前往北京，慶賀萬曆皇帝（1563-1620）聖節。兩人的身分背景南轅北轍，但作者注意到兩人的日記卻同樣充滿對明朝吏治、學術與宗教嚴厲的批判，且其據以評價中國的皆是來自中國的話語。作者強調朝鮮使節「面對著『中華』的現實，利用『中華』的價值體系來回應中國官僚的挑戰」（頁 11），換言之，許篈「變成了徹底的『中華』人」。（頁 15）不過，當趙憲歸國後，他爲了在朝鮮國內推行政治改革，援引中國經驗而做的《東還封事》，卻不見絲毫關於明朝的負面記載。相反地，作者認爲趙憲爲推廣其政治理想，將明朝描繪成完美的烏托邦。朝鮮士人將典籍中的理想中國作爲重要的政治資本，趙憲私人日記與報告書《東還封事》之間巨大的落差，正映照出理想中國與現實中國的距離。

第三章關注的是燕行使閔鼎重（1628-1692）與一位河北生員王公濯的問答，作者藉雙方共 32 則的筆談，檢視康熙八年（1669）一位名不見經傳的秀才，具備何樣常識？日常所思爲何？而肩負任務的使臣又如何向國內回報？令人感到意外的是，王公濯關於各種時事如「安南國來朝」、「南明的情況」以及「臺灣問題」的判斷皆符合歷史事實。但是，與王公濯的陳述有所不同，閔鼎重的報告書卻刻意強調清朝局勢日益艱危。作者指出，朝鮮燕行使即使得知清朝日趨安定的情報，卻仍只揀選那些符合朝鮮知識階層預期的消息，而這正是朝鮮人的「常識」。

第二部「十八九世紀燕行使與通信使進行的學術討論與學術交流」共五章。第四章至第七章從朝鮮燕行使、通信使的視野出發，考察使臣如何看待清

代考據學（漢學）、日本古學（徂徠學）的影響，進而審視這些外來學問如何傳回朝鮮國內。事實上，朝鮮在十九世紀作爲東亞唯一堅守朱子學（宋學）的國度，燕行使及通信使面對相同的挑戰。道光六年（1826），燕行使申在植（1770-?）與中國士人汪喜孫（1786-1847）之間的筆談即是一顯例。汪喜孫爲說服申在植信服漢學，舉出凌廷堪（1757-1809）等人的著作，強調從訓詁考據的方式入手，則宋儒之言驟失其理。從未讀過顧炎武（1613-1682）、戴震（1724-1777）等人著作的申在植，根本無法以漢學的治學方法回應其質疑。

作者指出，朝鮮士人的藏書條件不比清儒，朝鮮自始即不具備發展漢學的基礎。因此，作者認爲朝鮮使節與「絕非重厚君子」如翁方綱（1733-1818）、翁樹崑和葉志詵（1779-1863）交往，看重的是其文獻收藏，希圖能夠趕上中國的漢學。同時，倘若聚焦於乾隆十三年（1748）、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的朝鮮通信使身上，則十八至十九世紀中、日、韓三國在學術上的異同將更爲顯著。日本自荻生徂徠（1666-1728）以降，古學風行一時，徂徠學與漢學有異曲同工之妙，注重訓詁考據、旁徵博引的著述方式。乾隆十三年、二十九年前往日本的朝鮮通信使，起初還以爲日本盛行陽明學，殊不知日本同樣步入考據學時代。本書強調這是過去作爲文化輸出國的朝鮮，首次接受來自日本的刺激與挑戰。細察乾隆二十九年的朝鮮通信使，他們已知古學大行於日本，於是沿途收集古學相關著作，並與日本學者論辯。令人訝異的是，他們歸國後並沒有如實地介紹古學，這不僅因爲朝鮮「國法外宋儒而說經者重繩之」的傳統，更重要的是徂徠學與朝鮮國情不符，可能顛覆過去朝鮮爲文明上國的形象。然而，明乎此點，一方面燕行使、通信使扮演的文化角色更趨清晰；一方面何以朝鮮使節與中國士人激烈地辯論「漢宋」問題，正因爲朝鮮明瞭自身已是唯一的朱子學信奉者了。

第八章探討的是乾隆三十年（1765）燕行使洪大容（1731-1783）與乾隆二十九年通信使元重舉之間的關係。洪大容與中國儒生結爲知己，後將雙方筆談集結刊行，是爲《乾淨衕筆談》。作者強調是書扭轉清初以降朝鮮對清朝的

蔑視與敵意，堪稱改變中朝交往的關鍵。值得注意的是，這兩次使行中，當朝鮮人向中、日友人告別時，中、日士人不約而同地感傷落淚。有趣的是，兩次朝鮮使節皆將此種行爲視爲「多情」，責其「太過」。倘若從十八世紀漢學、朱子學、古學的脈絡理解，本章藉著兩次使行關於「情」的討論，無不彰顯程朱理學強調克制情緒的特色，尤其相較中、日兩國的「多情」，正側面地呈現中、日在思想上的相似，及朝鮮在學術上的孤獨。

第三部「燕行錄與使朝鮮錄」共二章，收錄作者對《燕行錄》、《使朝鮮錄》所做的詳細題解。作者有感於「關於燕行錄的基礎研究，到目前爲止尚不存在。相反卻充斥著謬誤百出的書目提要，研究者在這種情況下無法將研究推向深入」，（頁 197）且韓國學者林基中的基礎研究亦「完全不足置信」（頁199），於是認爲有必要就每種燕行錄的作者、旅程、內容嚴加考察。第三部爲《燕行錄》與《使朝鮮錄》提供詳盡的介紹，是重要的參考索引。

二

由本書各章的內容觀之，作者不僅投入各種朝鮮使節的研究，撰有數篇相關論文，探討東亞國際關係的新面向，同時作者仍不忘史家的本門功夫，考訂浩如煙海的燕行文獻，學者皆可按圖索驥，足見其用力之深，夫馬氏此種治學風範堪稱學界楷模。關於本書豐富的研究發現，筆者謹就以下三點探討其意義，並提出若干淺見就教於方家。

首先是關於「東亞國際關係史」研究與「東亞」的內涵。綜觀本書的各種議題，作者實是出入東亞三國使行文獻之間，如對日本古學的著墨及考辨朝鮮文集與《燕行錄》記載中的異同，此三國的掌故皆須熟悉，方得釐清。同時，諸章除涉及《燕行錄》、《使朝鮮錄》本身的介紹與考訂外，更著眼於將不同的個案串聯，如經過第一部的討論，正提醒未來的研究者不應只注意清代燕行使的言論，而需將明清燕行史之關係納入考量。這不僅反省過去依據清代《燕行錄》判斷明代中、朝關係的現象，更重要的是使臣歸國的報告書亦不可盡信。

就前者而言，學者基於閱讀清代文獻的認知，於是將明、鮮關係一切歸諸友好親善，這顯然值得商榷；就後者論之，《燕行錄》等文本固然極具參考價值，但仍須對史料本身進行研究，方保正確無虞。

此外，關於朝鮮使節與中、日士人爭論漢宋問題，以及燕行使與通信使面對「情」的回應等議題，若僅將燕行使、通信使視爲孤立的兩條路線，必忽略當時三國間的相互流通。事實上，不妨將晚明以降的東亞視爲一有機體，往來其間的使節傳譯、內化各國資訊，透過使節之眼呈現活潑生動的網絡，正是本書關心學術討論的原因。職是之故，通信使面對古學的衝擊與燕行使回應考據學的辯詞之間實有脈絡可循，唯有將三國視爲整體，方得以捕捉其間細膩微妙的影響與變化。更重要的是，明末以降，朝鮮人與中國、日本士人就學術問題辯難，牽涉著學界對「東亞」一詞的定義與內涵。近代早期存在一個文化上同質的東亞嗎？若僅就燕行使與通信使的文獻觀之，則東亞之間對於學術思想的差異遠較「漢字」、「律令」、「冊封體制」顯著。[1]

第二，是關於「從知識傳播看文化交流」的研究取徑。本書的主角不論是燕行使或通信使皆是朝鮮人，因此在學術分類上多半視爲「中、朝」或「中、日」關係史之流。乍看之下並無不妥，不過其研究取徑實不可與其他著作一概而論。事實上，本書與孫衛國《大明旗號與小中華意識》、葛兆光《想像異域》二書雖同爲中、朝關係史研究的重要著作，[2]但側重的問題與處理的方法不盡相同，甚且大異其趣。蓋孫氏論述的主軸圍繞著朝鮮士人如何「尊周思明」，討論的範疇含括朝鮮國內各群體，《燕行錄》不過是其立論基礎之一，不妨視爲朝鮮史研究。相較之下，葛氏關心的是朝鮮士人對中國的觀察與想像，以及

1 關於近來熱門的「東亞」議題，筆者謹提供兩篇反對以「中國中心式的東亞」或「泛稱式的東亞」作爲分析概念的作品，供讀者參考：葛兆光，〈從「朝天」到「燕行」——17世紀中葉後東亞文化共同體的解體〉，《中華文史論叢》，總輯81（2006年3月），頁29-58；〔日〕杉山正明著，周俊宇譯，《顛覆世界史的蒙古》（モンゴルが世界史を覆す）（臺北：八旗文化事業股份公司，2014），頁79-93。

2 孫衛國，《大明旗號與小中華意識——朝鮮王朝尊周思明問題研究（1637-1800）》（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葛兆光，《想像異域：讀李朝朝鮮漢文燕行文獻札記》（北京：中華書局，2014）。

此類來自異域的記述如何爲中國史研究所用。因此，《想像異域》筆下的篇幅較集中於燕行使絡繹於途的過程，而非歸國後的結果。反觀本書，儘管朝鮮使節閔鼎重選擇性地報告中國情況，確與孫氏「尊周思明」之論相符，燕行使申在植及通信使元重舉筆下的中、日兩國，亦同於葛氏指出甲申之後東亞劇變的情況，但本書的用意卻不僅止於此。

簡言之，作者雖意識到朝鮮使節對情報的選擇，須按朝鮮國情而定，但其關心的是「情報」如何被吸收、利用、流傳的過程及影響。因此，王秀才問答的重心並非爲吾人揭示一位普通士人的生活日常，而是此類資訊如何傳回朝鮮國內。推而廣之，即使通信使明瞭日本徂徠學，仍不免揀選適符國情之訊息撰成使臣別單。作者據以推展論述的是各種「知識」的移動，而以「漢學」與「古學」爲主題的第二部最爲顯著。中、日兩國作爲朝鮮的他者，知識如何傳播及其彰顯的心態，絕非用「比較」方法審視中朝、中日兩條路線所能洞察的。三人雖同樣注意到燕行文獻，討論的時代亦多所重疊，但本書顯是從朝鮮士人出發，探尋東亞的知識環流及其意義。

最後，是關於改變文化隔絕狀態的洪大容。作者指出朝鮮與中國之間的文化往來斷於明末，而這種「文化上的閉關狀態出現根本性變化的無疑是洪大容的燕行」（頁 143），將洪大容的燕行（1765-1766）視爲重啓中、朝文化交往的濫觴。儘管如此，當本書提及道光六年燕行使申在植無從回應汪喜孫等人的挑戰時，作者仍將原因訴諸「當時兩國的文化存在著很大的隔絕」，認爲洪大容爲首的北學派即使發展了半個多世紀，「而像申在植那樣根本沒有讀過顧炎武、閻若璩和段玉裁著作的士大夫在朝鮮社會絕非少數」。（頁 73）由此觀之，朝鮮在洪大容燕行之後，與中國的交往究竟是日漸開放，抑或是日趨封閉，本書似應作明確的交代。

事實上，洪大容及其後的朝鮮知識階層提倡「北學中國」，[3]改善與清朝的關係，在朝鮮史上以利用厚生的學風著稱，確與清初以降敵視清朝的風氣大

3　典故出自《孟子・滕文公篇》：「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

不相同。但是，北學派的論述應是朝鮮士人共同肯定的價值，抑或是諸多「中國論述」之一，似尚有討論空間。從洪大容歸國後受友人的譏諷與批判觀之（頁160-164），北學派思想雖不乏有後繼者支持，但也面臨不小的質疑。更重要的是，葛兆光的研究指出「就連考據學家中似乎很有學問的一些大學者，也不見得能讓他們（朝鮮人）俯首稱臣」，並強調朝鮮使節瞧不起考據學，認爲清儒「只會以所謂聲律爲沽名釣譽的本事」，[4]這顯與本書呈現朝鮮人無法回擊漢學挑戰的情況有別。即使是洪大容等北學派士人在世之時，北學派論述宜應視爲種種「中國論述」之一，而非壓倒一切的「根本性變化」。

三

綜觀本書三部的討論，作者用心考訂日本所藏《燕行錄》及幾種重要的《使朝鮮錄》，堪爲學者不可或缺的研究指南。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以五章組成的第二部，實是一篇探討東亞交流網絡、朝鮮文化心態、中國考據學風尚、朝日交流史的長文。藉由本書的成果，學界過分強調朝鮮通信使向日本宣播文化的形象，似應納入乾隆十三年的特殊經驗，方得齊全。同時，從「文化交流」的層面省思「朝貢體系」的架構，其間的交融與互動躍然紙上，這正是過去關注「國交」的思維所忽略的。吾人若將目光聚焦於「朝鮮使節」與中、日士人的互動，則文化、思想、經濟、政治的交流皆得以見其端倪。作者自承，何以在日文版尚付闕如的情況下以中文版的形式出版，原因是「當年朝鮮士大夫在中國旅行時所寫的旅行記實是太有意思了！……所以我想向學者們介紹這些史料的精彩之處」。（序頁2）對於從事明清史研究的學者而言，究竟朝鮮人筆下的中國旅行多麼精彩，對中國史本身具有何種意義，則有待學者考掘《燕行錄》的豐富記述了。

---

4 葛兆光，《想像異域：讀李朝朝鮮漢文燕行文獻札記》，頁52-53。